



| 下 卷 |

中国现代政治史

ZHONGGUO XIANDAI ZHENGZHISHI

■ 吴汉全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 下 卷 |

中国现代政治史

ZHONGGUO XIANDAI ZHENGZHISHI

吴汉全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封面设计:周方亚

版式设计:胡欣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政治史/吴汉全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01-014358-3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政治制度史-中国-1919~1949 IV. ①D6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02365 号

中国现代政治史

ZHONGGUO XIANDAI ZHENGZHISHI

吴汉全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76.25

字数:1200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4358-3 定价:160.00 元(全三卷)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下 卷】·

第十九章 相持阶段的中国抗战	793
一、日本侵华策略的变化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793
二、相持阶段初期正面战场的作战	799
三、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加强和反共摩擦的发生	809
四、中共团结抗战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阐发	825
五、汪伪政权及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	865
六、皖南事变的发生	869
七、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884
第二十章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抗战	891
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	891
二、日本强化占领区的统治与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斗	896
三、根据地军民克服困难局面的努力	898
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正面战场	916
五、国民党政权日趋腐朽	925
六、不平等条约的废除	930

七、对《中国之命运》批判及打退第三次反共高潮	932
第二十一章 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945
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战略进攻	945
二、中国的敌后战场转入局部反攻	948
三、国民党军队的豫湘桂大溃败	952
四、国统区民主运动的新高涨	955
五、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激烈较量	960
六、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983
七、有关抗战史的几个问题	990
第二十二章 争取和平民主的政治局面	999
一、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各党派的建国方针	999
二、重庆谈判和国统区反内战运动	1014
三、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召开	1027
四、国民党破坏政协协议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准备	1038
第二十三章 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	1054
一、全面内战的爆发与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	1054
二、国统区殖民地化及政治上走上绝路	1064
三、反蒋的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1076
四、中间路线的宣传及破灭结局	1084
第二十四章 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1104
一、人民解放军由防御转入进攻	1105
二、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	1114
三、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与国统区民主运动深入发展	1127
四、战略决战的胜利和国民党政权的覆灭	1139
五、新政协的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1158

结 语	1184
-----------	------

后 记	1191
-----------	------

第十九章

相持阶段的中国抗战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陷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改变了侵华策略,对国民党政府“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而将主要军事力量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日本的引诱下,汪精卫叛国投敌,建立了汪伪政权,配合日军对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国民党军队在相持阶段初期,仍然在正面战场进行抵抗,并且也打了一些较大的战役。此时,国民党加强了独裁统治,压制宪政运动,并在政治上将“反共”提升日程,对共产党发动军事摩擦,制造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其后又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面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共产党一方面提出了团结抗战的方针,反对国民党的投降分裂活动,以争取时局的根本好转,并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另一方面领导解放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同时在理论上进行创新工作,阐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建了毛泽东思想体系。进入相持阶段,中间人士一方面在政治上为抗日救亡运动献计献策,积极发起和参与宪政运动,另一方面在组织上向政党方向发展,于1941年3月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积极抗日和争取民主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

一、日本侵华策略的变化与汪精卫叛国投敌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一开始呈主动攻击的态势,企图在短期内迫使中国投降,故而中国军队在抗战初期处于守势。但随着战争的继续,日军在

战争中人力、物力、军队的消耗,以及战线的延长,放慢了军事上进攻的势头,战争双方呈现了相持的态势。至1938年10月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改变了侵华的策略,对国民党政府实施“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积极策划国民党官员的投降。在日军的诱降政策下,一向持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的汪精卫叛国投敌,在侵略军的刺刀下乞讨生活,成为可耻的民族败类。

1. 相持阶段到来的原因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第一,日军经过15个月的作战虽然深入中国内地,并在正面战场占据优势,但遭到严重的损失。从抗战开始到武汉会战,日本侵华陆军已占其陆军师团的三分之二以上,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而且,随着战场的扩大和战线延长,使日军兵力分散,首尾不能相顾。

第二,中国人民的抗战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迫使日本改变策略。中共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严重威胁着敌人占领区,迫使日军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逐渐转移其军事主力于巩固占领区。这样,中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2. 日本侵华策略的变化

进入相持阶段,日本侵华策略不得不发生变化。日本侵华策略的变化,主要是:第一,日本帝国主义被迫改变了“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用“以华制华”的政治进攻和“以战养战”的经济掠夺,维护对华的长期战争,即所谓进行“百年战争”。第二,改变了过去对国民党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把重视国民党正面战场、轻视敌后战场,改变为集中很大军事力量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进入相持阶段,日本的侵华策略为什么有如此的变化呢?概而言之,有以下原因:

一是日本以伤亡几十万人和巨额军费开支的代价占领了中国大片领土,

但中国并没有屈服,日本灭亡中国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二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继续坚持抵抗,敌后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形成了两个战场共同抗敌的局面;

三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虽然占领了相当大的区域,但战区的扩大和战线的延长,也使日本军队不足应付,财政开支日露窘态,难以为继;

四是日本国内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反战情绪不断高涨,这就迫使日军改变战争初期的策略,力图以最小的代价占领中国;

五是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无法改变,幻想通过策略的改变来打开外交上的被动状态。

日本为了推行新的侵华策略,采取了以拉拢国民党为中心的各项措施,对国民党进行政治上诱降,从而为扩大侵略战争减少阻力。日本的具体措施主要是:

一是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1938年11月3日)。1938年11月3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声称欢迎国民党政府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改变了它在同年1月16日声明中“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策(第一次近卫声明),公开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二是发布所谓的《调正日华新关系》(1938年11月30日)。1938年11月30日,日本政府和日军大本营制定了《调正日华新关系》,决定在不扩大战局的条件下,加强“政治谋略”攻势,迫使国民党屈服。这个方针,作为近卫内阁的基本国策和对国民党诱降工作的基础。

三是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1938年12月22日)。1938年12月22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声明,公开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第三次近卫声明的要点是:(一)中国政府“放弃抗日”,与日本、“满洲国”“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二)签订日华防共协定,在特定地点驻扎日军,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三)中国承认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特别是在华北、内蒙地区的资源开发利用上积极地向日本提供便利。

四是由喜多诚一拟定所谓的“和平计划”(1939年2月)。日本近卫内阁

第二次对华声明发表后,汪精卫等逃离重庆,叛国投敌。日本诱降政策取得部分成效。为了进一步诱降蒋介石集团,1939年2月,华北日军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拟成所谓的“和平计划”,改变了以蒋介石下台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声称要“尊重蒋介石上将的地位而给予崇高位置”。

五是推出“平沼演说”(1939年3月)。1939年初,日本新任内阁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正式提出: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政府,假如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合作建设“东亚新秩序”,日本准备与其作中止敌对行为之谈判。此为“平沼演说”。

日本费尽心机,不断对蒋介石集团进行诱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到1940年11月,日本政府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在对蒋介石集团的态度上发生微妙的变化,强调“应用尽政治策略和战争策略上的一切手段”,“竭力设法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敌意志,迅速使其屈服”。

为了达到使国民政府屈服的目,日本除了政治上诱降以外,还采取建立伪中央政权,促进占领区的治安;利用汉奸推动抗日军队内部崩溃与争取新官僚,策划西南独立,断绝外援等方法,力图促使国民党政府崩溃。

军事上,日寇将从包头连接黄河下游、庐州、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区。其中,华北为特别重要地区。当时,进行武汉作战的部队,除留下6个师团外,其余部队主要调往华北;华南的作战部队也主要调往华北,进行“扫荡”作战。其他占领区,划为作战地区。同时,在武汉及广州地区各置一支部队,在政治上和战略上压制正面战场。

日本在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对国民党政府政策的变化,虽然没有使蒋介石政府屈服,也没有使国民党政府崩溃,但对中国抗战还是产生很大影响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分裂。受日本诱降的影响,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得势,投降势力增长,投降之风盛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敌,甘心做日本侵略者的傀儡,成为日军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民的帮凶。

第二,国民党政府的抗战政策发生新的变化,坚持抗战的立场有所动摇。相持阶段到来后,由于日军对国民党政府采取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使得国

民政府坚持抗战的立场有所动摇。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国民党政府政策变化的标志,表明国民党内的动摇、妥协、反共的倾向有所增长。

第三,日军加紧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使敌后解放区战场成为抗日的主战场。相持阶段到来后,日军将军事上进攻力量集中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战更加艰难,形势严峻。中共在艰苦抗战的同时,还必须反对国内的投降危险。

3. 汪精卫叛国投敌

日本在考虑改变其侵华策略的同时,大力进行拉拢汪精卫投降工作,力图在国民党阵营中打开缺口。

汪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集团的成员还有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曾仲鸣、陶希圣等。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委,宣传部副部长,军委第二部副部长。陈公博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四川省党部主委。陈璧君是汪精卫的妻子,国民党监察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曾仲鸣是国民党候补中委、国防最高会议主任。陶希圣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典型的民族失败主义者。抗战开始后,汪精卫说“因为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还说,“我们是弱国之民,我们所谓抵抗,无他内容,其内容只是牺牲”。要避免因抗战而遭悲惨灭亡,只有对日“和平”。以汪精卫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有周佛海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参加的“低调俱乐部”,宣传“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积极酝酿对日“和平运动”。

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活动,是通过其所谓的“和平运动”来实现的。

汪精卫集团的“和平运动”由周佛海在汉口指导进行。在周授意之下,1938年1月,原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派其属下原第一科(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到上海,会见日本有关人员,打通与日本方面的联系。第一次近卫声明发表后,董于1938年2月中旬秘密到东京,先后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课

长影佐祯昭、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参谋次长多田骏,证实了日方愿意迅速实现对华“和平”的意图。6月23日,高宗武受汪精卫、周佛海的秘密指派亲自去东京,试探日本对汪精卫的态度。在日本,高宗武会见陆相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次长多田骏等人,就由汪精卫出面进行“和平运动”达成谅解。7月9日,高宗武回国。

在“和平运动”的旗帜下,汪精卫集团加快了叛国投敌的步伐。1938年11月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在上海会议,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内容:汪精卫集团表示参加“建设东亚新秩序”,同意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承认伪满、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本土有居住营业的自由、日本有开发利用中国资源的特权、赔偿日本侨民损失,与日本共谋实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以及经济提携的成果”。日本方面同意汪精卫集团提出的成立伪政府等行动计划。双方商定,协议内容由日本作为第三次近卫声明发表,然后由汪声明响应并开始行动。

1938年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曾仲鸣、陈璧君、陶希圣等,经昆明叛逃至河内。21日,陈公博也叛逃至河内与汪会合,22日,日本照预定步骤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响应。这个由汪精卫发表的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通电,宣称愿以近卫声明中提出的三原则与日本作“和平谈判”,认为只有这样,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以图诱劝蒋介石对日妥协。“艳电”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国投敌的标志。

汪精卫等叛逃至河内后,国民党中央曾派人去劝阻,但被拒绝。随即国民党派人去河内暗杀,曾仲鸣被击毙做了替死鬼。12月26日,蒋介石发表训话,驳斥第三次近卫声明,表示要为中国的独立而战。但蒋在此次训话后,又说汪叛逃河内“纯粹为私人养病而往”,“纯系个人行为,毫无政治意味”。还说“汪先生爱党爱国,终始一贯,必以共赴国难精神,贯彻抗战目的”。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会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6月,国民政府对汪下通缉令。

二、相持阶段初期正面战场的作战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虽然对国民党军队采取“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但还是集中了不少军事力量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企图削弱国民党军事力量而迫使其投降。进入相持阶段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仍然进行抵抗,打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战役。

1. 长沙大火

“长沙大火”是1938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为实行“焦土抗战”而纵火烧毁长沙的事件。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一部沿粤汉路继续南下,进入湖南北部,不断空袭轰炸长沙等地。1938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岳阳。13日,蒋介石电令湖南省主席张治中:“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此时,长沙即将失陷的谣言在城内传开。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的指示,于11月13日凌晨,下令军警纵火烧城。大火燃烧至14日方熄。长沙城内2/3房屋焚毁,2万余人被烧死,财产损失无数。然而,日军并未立即进攻长沙。为平民愤和推卸责任,国民党政府将酆悌等3人枪决。

2. 南岳军事会议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出席会议有国民政府军委会主要委员,第三、第九战区的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100余人。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应邀出席。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一是会议对相持阶段的抗战作了新的部署。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将武汉撤退、岳阳失守之前的抗战为第一期,之后的抗战为第二期。指出:“我们过去虽遭受了挫折,但我们的挫失,客观上也只是到此限度为止,从今以后,由于作战经验的增加,战略部署的完成以及军费的增加和敌我实力消长士气盛

衰的对比,我们胜利的把握和信心,一天一天提高起来。……这也就是证明敌人今后决不能消灭我们的军队,亦就不能消灭我们的国家,反之,我们的力量,最后一定可以打破敌人,消灭敌人,以求得我们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复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①会上,蒋介石还提出国民党军队今后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主张^②。会议决定以全国现有部队的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在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作战,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每批整训四个月,一年之内将全国军队全部整训完毕。

二是会议重申继续实施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采取转守为攻,牵制和消耗敌人的战术,以期反攻胜利。蒋介石在会上发布了《第二期抗战要旨》。会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南岳军事会议精神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其中说:“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化敌人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③这个方针规定以敌后游击部队作战为主,大量的国民党正规军只作策应游击部队的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而把整训和加强战斗力作为重要任务。这就是说,主要让八路军、新四军同日军作战,而蒋介石则以加强实力为基础,相机行事,左右整个中国的局势。

三是会议决定整顿军队,重新划分战区;简化指挥层次,以提高部队战斗力。会议重新划分了战区,调整后的部署为:“一战区:豫北及皖北,司令长官卫立煌,辖12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特种部队未列入);二战区:山西及陕西东北部,司令长官阎锡山,辖32个步兵师,14个步兵

① 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幕训词》,《总统蒋介石思想言论总集》第15卷,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4年版,第486—487页。

② 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72页。

③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1),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印,1981年版,第568页。

旅,5个骑兵师,3个骑兵旅;三战区:苏南、皖南、浙闽两省,司令长官顾祝同,辖22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四战区:两广,司令长官张发奎,辖18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五战区:鄂豫皖三省交界处,司令长官李宗仁,辖3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骑兵旅;八战区: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司令长官朱绍良,辖6个步兵师,9个步兵旅,4个骑兵师,4个骑兵旅;九战区:赣西、鄂南及湖南,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理),辖52个步兵师;十战区:陕西,司令长官蒋鼎文,辖9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鲁苏战区:苏北及鲁南,司令长官于学忠,辖7个步兵师;冀察战区:河北及察哈尔,司令长官陆钟麟,辖5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①会议决定设立战地党政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在沦陷区设立分会。

南岳军事会议提出的军事决策标志着国民党政府完成了军事上由战略防御阶段向战略相持阶段的过渡。但国民党军队在后方整训结束后并未开赴正面战场,而是把大批装备精良的部队置于大西南、大西北,保存实力;至于开赴敌后的国民党部队,成为与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搞摩擦的主力,有些军队名为“曲线救国”,实际上是与日寇“合作”。这样,在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和国民党各自从不同的意图出发,都把解放区战场摆到抗日战争主战场的地位。

3. 南昌会战(1939年3月至5月)

为完全切断中国外来战争物资补给的通道,加强对中国海岸线的封锁,1939年2月,日军攻占海南岛。南昌会战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生的。

日军为占领南昌,切断浙赣路,阻断皖浙方面中国军队的主要联络线,1939年3月17日,日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以3个多师团兵力在空军配合下,分三路向南昌发动总攻。中国守军(第九战区和第三战区部队)在南昌外围与市区同进攻之敌展开激战,3月27日南昌失陷。4月21日,中国军队组织20个师(第九战区部队)反攻南昌,激战数日,直逼城郊。5月1日,蒋介石下令限期攻克南昌。中国军队重新部署后,于2日向南昌猛烈推进,5日攻占南昌车站、飞机场。日军在南昌城东南和南郊一带顽抗,全力死守,中国军队

^① 蒋纬国总编著:《抗日御侮》第6卷,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3—4页。

屡攻不下,伤亡惨重,于9日奉命退回原地。中国第三十九军军长陈安国于是役中壮烈殉国。南昌会战是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军队在江西南昌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一次战役,虽未达到作战意图,但对日军给以重大的打击。

4. 随枣会战(1939年5月)

日军在1939年4月即进行随枣会战作战计划的拟定,并进行了相关的准备。这次会战的目的在挫败国民党军队“继续抗战的意志”,计划“在5月初以前,秘密将江北各兵团及军直辖部队的主力集结在应山及安陆附近,做好会战准备”,以其“江北兵团秘密”捕捉国民党军队,“准备进攻的态势”,“采取快速奔袭给予反击”,以达到在枣阳附近一举歼灭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队^①。

在随县、枣阳一带,中国军队有张自忠的右集团军、李品仙的左集团军、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廖磊的二十一集团军、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孙震的第二十二集团军等部队。李宗仁于4月30日下发了第五战区命令,决定“战区决以主力行攻势防御,粉碎敌之企图,长久保持襄河东岸地区,一部渡河攻击,竭力牵制敌之兵力,俾我主力之作战容易”;同时,“我廖(磊)集团约两师,并指挥沈、黄两部,主力向花园、广水间,一部向信阳西进,策应我主力作战”;江防军一部“推进沙洋、十里铺、沙市间地区”,“河防部队应派有力部队渡河攻击,在襄河东岸获得据点后,应竭力扩大战果,向血口、沙港方面侧击”;“右集团军应竭力增强襄河东岸部队,以纵深配备,阻止敌之北上,掩护我左翼兵团之右翼”^②。

1939年5月,冈村宁次率日军3个师团和第四骑兵旅团约10万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湖北的随枣地区,企图消灭中国第五战区主力,巩固武汉外围阵线。中国第五战区部队与敌激十余天,终因敌强我弱,随县、枣阳等地相继失守。5月15日,中国守军发起总攻,收复了失地。是役,日军未达到其预

①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22页。

②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页。

期的目的。

5. 两次长沙会战(1939年9月、1941年9月)

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位于湘江下游、洞庭湖南,是粤汉、浙赣、湘桂铁路要冲。在东南沿海被日寇占领之后,湖南是大后方国军兵员补充及供应粮食的基地,内迁的大量工厂亦有不少集中于湖南。在战略上,湖南是大西南的重要屏障,长沙有失,重庆难保,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

1939年9月,日军由冈村宁次率领第十一军10万余兵力,在海空军配合下,第一次进攻长沙,企图消灭粤汉铁路方面中国军队的主力。敌军分三路进攻。中国军队的指挥官是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共有军队24万人。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顽强抵抗。赣北、鄂南两路均被中国军队击退。主战场湘北方面,中国军队利用地形,节节抵抗。日军曾进抵长沙外围,但因粮弹消耗已尽,遂于10月初撤回原阵地,未能达到攻占长沙的目的。此役从9月17日开始,到10月8日,共22天,是1939年正面战场上规模最大的战役,史称第一次长沙战役。

1941年9月,日军为给中国第九战区部队一大打击,由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几率领的10余万兵力第二次进攻长沙,发动第二次长沙战役。中国方面负责御敌的,为薛岳率领的第九战区所属部队,其作战计划是:“先于关王桥、大荆街及金井、福临铺、栗桥、三姐桥各一带地区,构成纵深坚固阵地,节节抗拒敌人,消耗敌力,并彻底转用赣北、鄂南方面兵力于杨林街、关王桥、长乐街、平江、沙市街、永安市方面,自东向西对敌侧击,及以有力兵团紧衔敌尾,南渡汨罗江,对敌尾击。同时,加强外翼,争取外翼,对敌形成反包围。”^①9月17日,日军以主力发动强大攻势,很快突破中国军队的三道防线,并在9月28日攻占长沙。中国军队与敌激战,伤亡惨重。随后,中国军队从各地汇聚长沙外围,形成对敌包围之势。据有关资料记载:

^① 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